

●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The Idea of a Tow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

城之理念

——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

[美] 约瑟夫·里克沃特 著
刘东洋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之理念》(The Idea of a Town)是当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评论家约瑟夫·里克沃特 (Joseph Rykwert) 的建筑理论名著。这本书是一部有关城市形态学的经典之作，一部可以在许多方面改变人们现有“城市观”的大作，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在本书中里克沃特教授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史、城市史融会贯通，采用史诗般的叙事结构，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证据，将使读者获益匪浅。此书已经再版多次，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被许多学校列为建筑学课程的教材。

作者简介

约瑟夫·里克沃特 (Joseph Rykwert)，当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评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教授，英国艾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艺术教授，并且是剑桥大学艺术学院“斯雷德教授” (The Slade Professor)。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 现代设计的先驱者
-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
- 建成环境的意义
- 建筑美学
- 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
- 反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
- 建筑与个性
- 可持续性建筑
- 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
- 诗意的建筑
- 共生的思想
- 城市的意义
- 空间的语言
- 建筑构成手法
- 比例——科学·哲学·建筑
- 现代建筑语言
- 建筑空间论
- 亚当之家
- 城之理念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城之理念

——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
城市形态人类学

[美] 约瑟夫·里克沃特 著
刘东洋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352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之理念——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 / (美) 里克沃特著;
刘东洋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ISBN 7-112-08131-9

I. 城... II. ①里...②刘... III. 城市规划—研究 IV. 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480 号

Copyright © 1976, 1988 by Joseph Rykwert

The Idea of a Tow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 Form in Rome, Italy and the Ancient World/Joseph Rykwer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经约瑟夫·里克沃特先生正式授权我社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中文版

责任编辑: 黄居正 田 力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张景秋 关 健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城之理念

——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

[美] 约瑟夫·里克沃特 著

刘东洋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制版: 北京嘉泰利德制版公司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frac{1}{4}$ 字数: 377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ISBN 7-112-08131-9

(1408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The Idea of a Town



出现在该大理石浮雕上的两个男人身穿罗马宽袍（Toga），赶着两头牛（公牛？）在犁地，后面跟着装束相似的几个人物。浮雕的年代为公元 3 世纪，出土地点是阿奎利亚（Aquila）。因为宽袍几乎就不是罗马农民阶层的装束，发掘者们倾向于认为这一浮雕表现的是一个仪式场景，也就是说，是罗马人耕出“第一垄”的场景。不过，宽袍的穿着方式（没有将头部裹起来）与有关该礼仪的描述有出入。

图片来源：“Notizie Scavi”，1931，p.472 ff；“Archaeologischer Anzeiger” 1932，p.454。Museo Civico，Aquila

献给 A & A & A 以及迈克尔·艾尔顿 (Michael Ayrton)

“……既然如此，就无需将珍诺比亚 (Zenobia) 划归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城市范畴。按照这种类别区分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区分，则另有两类：一类是经历岁月沧桑，而继续让愿望决定自己形态的城市；另一类是要么被愿望抹杀掉，要么将愿望抹杀掉的城市”

伊塔罗·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

再版前言

从本书最初构思和撰写的时间算起，三十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考古学家们一直活跃在罗马、拉丁姆（Latium）和伊特拉斯坎（Etruscan）的聚落遗址，同时还涌现出来大量新的历史学和语源学的研究成果。但最重要的是，人们阅读本书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因此，我将首先谈谈这个问题。

本书的再版很合时宜。本书最早是作为荷兰《论坛》（*Forum*）杂志评述的特别专集出现的。该杂志的编辑凡·艾克（Aldo van Eyck）认为，这本书或许会成为建筑师们的备忘录，以提醒他们关注那些似乎已被遗忘了的东西，即城市不只是对生产、市场、交通和卫生问题的一种理性解决的答案——或者是对某些物质性和市场性动力的自动反应——还应该铭记人们的希望与恐惧。

在当时，城市理论家们偏爱的城市形象就是把城市想像成为似乎具有某种内在本能的东西，可以不假思索地对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作出反应。如果城市真是这么一种“自然性”产物，接下来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并遵守城市的技术性增长、土地市场机制或者交通流量的“法则”，这样，规划师和建筑师们就可以不必在他们的主观上有什么责任感，也不需要价值判断——还有，不需要技巧，他们似乎可以不必再为任何艺术的“规则”发愁了。

在当时，对于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住宅”，而且他们坚信，建筑就是“住宅”，“住宅”不可避免且不容质疑地就意味着点式塔楼或者板楼。在20世纪60年代住宅建设的盛期，许多多少可以被称为先锋派的建筑师们（就是那些画了许多图却建了很少楼的人）生产出一堆设计方案来，这些方案都假定生产和技术将持续不断地迅猛发展。在这方面，有两伙不同的人。一组是工作在巴黎的荷兰画家—乌托邦幻想家聂文惠斯（Constant Nieuwenhuis）和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另一组人是苏联的NER小组。与此同时，“知名”的大建筑师如丹下健三（Kenzo Tange）和鲁道夫（Paul Rudolph）——后来，还有那些“商业化”的事务所们——也做过类似的设计。因为要实施这些方案必然需要高度的工业化预制生产，此类项目就对建筑产业产生了吸引力。英国小组阿基格拉姆（Archigram）和它的追随者们一下子抛出了大量疯狂的图画，画面上的城市综合体充斥着一个个插着管道的太空舱（capsule）。“插入式城市”（Plug-in City）、“步行城市”（Walking City）和这些方案一道都变成了口号。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日本新陈代谢派（Metabolists），如他们的名字所显露的那样，他们希望城市规划应是为了不断变化的过程而设计的程序。他们同样试图把居住削减成为一个个舱房，不过，他们图画上的这些舱单元集合成为的是一些随机甚至具有侵略性形状的结合

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些草率之作，当时全世界年轻的建筑师们都在大量地生产着类似的设计。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把城市规划视为任何意义上的“艺术”，这样的想法会被当成是可笑的明日黄花（ridiculous passé），而认为城市肌理可能具有某些“象征性”则更会被当成是天大的笑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城镇是一架复杂的机器，就像某些生物学家所研究和描述的有机体那样，是生产和工作的机器，所有那些插件和机器人形象都代表和描绘着这一理念。

为了表现运转的状态，城市不仅要看上去像个发动机，它的不同功能必须要被组织起来，划成区块，以便更高效地工作。在这类分区设计中，影响力最大者就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20世纪30年代的说法，城市的功能即居住、休闲、工作和交通。把这样的思想强加在任何现有城市的格局之上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在20世纪40、50、60年代里，许多的城市开发项目恰恰就是遵从这样的思想建起来的。它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分离的目的，最常见的就是将原本在地面上的居住区叠成高层，而将其他功能留在地面。当然，除了某些高层里还保留着若干取代了老宅内廊的廊街，高层住宅其实已经将居住和公共空间隔开了；而那些用于工作的建筑，还有那些用于休闲的建筑——常常指的是教堂、图书馆、法院甚至剧场和游泳馆——都在高层住宅的映衬下成了矮子。奇怪的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分区规划的倡导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居然在他设计的著名的马赛（Marseilles）公寓里把这些规则都打破了，因为他在这个公寓的中间层里设计了一条层高颇高的商业街，而且还把一个幼儿园和剧场放到了屋顶。勒·柯布西耶的设计只是一种门面，而且孤掌难鸣——当权者或者他的同仁们没有对这一设计产生任何认同感。

住在那些由政府资助的高层建筑中的居民们渐渐地对此类设计表现出失望的情绪，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的失望已经变成了不满。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动摇了上述的信仰，起码是对它提出了质疑。1967年6月的中东“六日战争”触发的经济和能源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能源短缺的恐慌（后来被证明没有什么真实依据）同时触发了人们对原来希望用工业建筑和技术进步解决城市问题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不信任。更广泛地，人们开始认为原来那种相信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福祉的想法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情绪，被舒马赫（Ernst Schumacher）那本最初出版于1977年——也是他过世的那一年——的《小即是美丽的》（*Small is Beautiful*）作了最好的总结。

在这些“外部”世界发生巨变的同时，原本从规划师那里获得了好处的业主们也开始反对规划师们的想法。机器/有机模式曾经意味着一种对历史的清除，认为历史和规划师的工作无关；他们工作的信仰基础就是统计研究和其他的社会调查手段，他们以为有了这些手段，就可以根据市民现在的需要预测未来的需要。这种认为可以机械地研究或者模式化地研究社会功能的想法是建立在一个预设之上的。这个预设就是以人的需

要是整个社会体 (the whole social body) 的一种功能, 且能够被整个社会体“感知到”(felt)。事实上, 被“感知到”的需要仅仅是每个市民个体体验中的一部分。而且, 这些被感知到的体验还只能被叙述性地表达, 它们甚至不能被有效地图表化或用某些示意图的形式来表达。而叙述, 无论叙述者的地位多么卑微, 永远是历史性的。在城市肌理的研究中, 把历史研究从方法中清理出去之后, 城市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冲突只有效率的实体, 这样的城市可以被投射到时间意义上的未来中去了。只是在这种分区化的、高效运行的城市中, 人的痛苦与烦恼的体验、人类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已经找不到位置了。¹

在专业人士当中, 亚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在其杂文《城市不是一棵树》(The City Is Not a Tree) 中揭露了用简单数学模型看待城市复杂性的缺陷。剑桥 (Cambridge) 的马奇 (Lionel March) 所进行的研究则证明, 用高层住宅代替低层住宅的做法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的, 即通过将住宅集中起来变成高层之后可以节省空间。林奇 (Lynch) 开始调查城市中的居民通过近乎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方式所形成的城市意象 (image of city)。在建筑类型学 (architectural typology) 和城市形态学 (urban morphology) 的领域里——这些术语和相应的研究都和罗西 (Aldo Rossi) 有关——罗西关注的是对市民居住单元中稳定性格局的细部研究以及对由这些单元组成的城市质地的研究, 但是罗西的研究没有涉及到城市边缘与城市中心之间的张力问题。还有一些社会学者比如英国的威尔芒特 (Peter Wilmont) 以及后来更加激进的美国学者古夫曼 (Erving Goffman), 他们关注的是社会模式与住居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对城市当下形势的批判——从外表上看, 这些批判变得越来越整合化和“整体”化, 因此也越来越光鲜——却有着一个不利的因素: 它们都是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批判。它们的目的是在于说明城市在哪里出了问题、城市有哪些弊病, 但是, 没有中间层次, 没有理性的话语能够让规划师从过去的失败中走出来, 走向成功。在这些批判中, 能够对城市现象的整体给出一种广义和正面的阐述者寥寥无几, 而且, 即便是有的话, 也通常很令人沮丧: 他们当中之一——这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提名字了——在1980年前后抱怨到“有关城市形态的理论大多数都是出奇地无聊”, “城市理论不仅负面, 而且单调。这样的症状表明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这位作者接着说道, “城市规划已经停滞。”而另外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在20多年前就写道: “城市规划一片忙乱, 却无进步。”

城市理论的单调起码部分地是由理论抽象化造成的——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讲, 是因为一种距离感造成的, 而且, 这种距离感还掩盖着不可救药的无能。在20世纪50、60、70年代里, 有好几十年的时间 (如今可能还在这里或那里存在), 设计了那些最陈腐的城市综合体 (urban complex) 的设计师们在讲解他们的作品时——这些作品通常仅仅源自某些商业和“市场”机制的运作手段——这些设计师会在讲座中放上几张代表“理想”或“无时间性”的都市状况的幻灯片: 比如,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St Mark's Square)、

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意大利的某个山镇或是希腊岛上的村庄 (所有这些地方都是规划师度假的地方)。这些幻灯片的目的是用来支持他们的规划或计划的某个方面。人们通常很难针对这些佐证给予认同或者否定, 因为规划师的语言中通常充满套话, 这些套话不可避免地适于描述他们的规划, 也适于描述他们所选用的例子。提出矛盾或争议通常被认为是不礼貌或者是恶意的。在有关都市主义 (urbanism) 的书中, 对那些过去规划的讨论就更加令人不安: 例如, 朗方 (Pierre-Charles L'Enfant) 在他的华盛顿规划中所使用的混合式布局——用对角线式的大道切过方格子路网的做法——被认为是造成华盛顿城市的平庸生活的罪魁祸首, 而同样的格局, 在塞尔达 (Idelfonso Cerda) (1815—1876 年——译者注) 那里却成了在他的巴塞罗那恩桑彻 (ensanche) 开发中获得伟大成功的秘诀。

在社会和经济理论与物质肌理之间缺少联系的事实, 只是上面引文中人们所抱怨的巨大乏味情况的一个侧面。更严重的问题是规划师们曾以为: 规划不仅是个非历史过程, 还是一个非政治过程。这样, 一个世纪以来, 物质肌理的生长就向规划师们提出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挑战。

在对待都市主义的方法上, 如今最大的变化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再也不能仅用平面术语来讨论一个城市的物质结构了。比如, 天际线已经成了我们城市景观中最重要的视觉形象, 然而规划理论至今还不能对之给出任何完整的阐述。舒耶勒 (Montgomery Schuyler) ——他那个时代最敏感的美国建筑批评家——早在一个世纪前在评述纽约天际线时就曾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它不再像是建筑性的前瞻 (vision), 倒极像是商业操纵的结果……”²

尽管城市景观还没有真正走进理论话语, 但是已经受到了设计师们的长期关注。在其某些早期方案中, 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巨型方案中, 勒·柯布西耶就触及了这一问题。而路易斯·康 (Louis Kahn) 在费城的几个项目中, 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霍莱因 (Hans Hollein) 以及他的维也纳同仁们也曾痴迷于郊区或者野外那些巨型构筑物所具有的谜一般的、似乎不祥的象征力量。还有一些设计师则曾经尝试着建造一种能够浓缩三维城市的建筑片段, 其中最出名者要属“人居”项目 (Habitat) [由赛弗迪 (Moshe Safdie) 为 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设计的] 和考伯卡特 (Geoffrey Copcutt) 小组设计的康伯纳德 (Cumbernauld) 城市中心, 但是, 这些设计无论就其社会意义还是就其经济效益都不能算非常成功。与此同时, 在欧洲, 有人尝试着用巨型的综合体建筑 (比如柏林会议中心) 来跨越高速公路。在一个建筑综合体内, 不同类型的“流”形成了复杂的内部联系, 但毫无艺术性可言。在我看来, 这倒是一个建筑师—规划师必须介入的领域。

本书最初构思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正值战后建设的高峰期和规划师职业骄傲的高峰期。本书的立意是要对那些意大利城镇的结构及其建造者们的初衷进行一定的理性阐述。而这些城镇, 在那些仅以视觉美为导向的英美理论家们的眼里, 通常只会变成他们

怀旧抒情的游记和对比强烈的照片所记录下的美丽。本来，本书只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出版计划的一部分。那个更大的计划是要描述在过去的千年里各种城市的沉浮与改变。我当时是想和意大利社会学家多哥里奥（Carlo Doglio）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要完成这样一种写作，最自然的起点应该是库朗日（Numa Fustel de Coulanges）最初发表于1859年的《古代城市》（*La Cite Antique*）。很奇怪，在库朗日之后，没人将他的方法继续下去，去研究那些古代城镇的表意性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是怎样被城市居民所理解与传承的。这就是我曾经决定想写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恰巧读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书中记录了他在亚马孙盆地和路上的经历。我被他的有关村落布局、亲属体系、一群物质文化极其贫乏的博洛洛人（Bororo）的世界图景（world-picture）之间的统一性所打动了。我也被有关这个世界图景在各个方面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³的叙述所打动了。我那时也读到内哈德（John Neihardt）的《大黑麋的话：一个奥格拉部落苏族圣人的故事》（*Black Elk Speaks, 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书中描述了一个萨满预言家（shaman-visionary）认为白人强迫苏族人住进方形的房子，为的是切断奥格拉的苏族人从物质环境与他们环状世界图景之间的和谐中获得健康及活力的纽带：“……我们的帐篷也总像鸟巢那样是圆的，而且帐篷和帐篷在一起也要围成一个圆，那是我们民族的箍（hoop）。是神灵的启示让我们把一个巢建在许多巢中，以便我们哺育后代……”⁴这些阅读的经历把我引向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宗教史文集》⁵中有关神圣空间的那一章。尽管对之存在着诸多批评，那一章仍然是相关论述中最详细最有说服力的研究，即便是我个人近来对象征主义、神话、仪式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我还是没有改变对这一章的看法。

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出到第二版的时候作了相当的拓展。本书的理论背景受到后来一些研究的启示。例如，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自然符号》（*Natural Symbols*）与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相近的《阶级、代码、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⁶，都在试图提供一种有关象征（symbol）的历史经济学，也就是要论述我们认识自己身体的方式——以及这样的认识和语言性的或其他类型的信息性的认可及解读是如何受到我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的限定的。鲍德里亚德（Jean Baudrillard）的著作，⁷虽然和我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却让我认识到有关大众文化的象征主义本质的诸多问题。在《重思象征性》（*Rethinking Symbolism*）一书中，斯帕博（Dan Sperber）明确地对列维-斯特劳斯对待象征的符号学（semiotic）方法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将象征描绘成了一个封闭体系中的二元对立（counters）。对于这一点，我完全认同。⁸斯帕博指出，符号学不是研究象征性的合适方法，因为：

“象征不是符号（sign）……对它们的解读（interpretation）也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解读（meaning）……在学习象征的过程中的个体使用的数据并不构成像语言中的句型

一样的某种固定的集合(set)……这一认知本质意味着并不存在着类似于多层—语言性(multi-lingualism)的多层—象征性(multi-symbolism)……象征性数据,无论它们出自何处,在一个已知个体那里,它们都已被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系统……”

斯帕博有关象征性的观点,虽然与大多数的符号学解读相似,但它还是认知性(cognitive)和记忆性(evocative)的。本书就采纳了这样的视角。

塞尔(Michel Serres)⁹在思考李维(Livy)有关早期罗马的叙述时,曾经想加上“混合体的哲学”(philosophy of bodies in a mix)这么一个副标题。塞尔似乎已经采纳了斯帕博的视角,他把城市看成是一张叠加着各种“阅读内容”的残片(a palimpsest of superimposed “readings”),城市肌理的格子构成了一个唤起记忆的策源地(matrix),让人记起城市的历史和那些周而复始的谋杀与暴力。有些批评家批评我有关古代城市的观点过于田园化,可能仅在这点上,他们是说对了,我的目的仅仅在于显示古代城市的建设者们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工作并怎样将他们的工作理性化的。本书并不关心那些古人的规划是否部分地或全盘地失败了。

或许,不可避免地,古代城市的名声并不比现代城市的名声好到哪里去。可见,城市的恶名一直还是人们城市情感的一部分。

是上帝建造了第一个花园,是该隐(Cain)【《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Abel)——译者注】建造了第一座城市。¹⁰

像该隐一样,罗慕路斯(Romulus)也是一个弑弟者,这位城市奠基人的罪行仅仅是城市后来蒙受的诸多罪名的开始。我之所以引用了这个例子是想带出我的两点否认。

首先,我想提醒读者,对于古罗马的诗人和道德家们来说,城市是个败坏的地方:拥挤、肮脏、恶臭、嘈杂、暴力、腐败。就像有关现代城市的文献一样,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朱文诺(Juvenal)、马蒂尔(Martial)经常会冒出一些相关的抱怨来,因此,并不是因为本书旨在将古代城市描写成为一种理想的环境,所以本书不给古代的“恐城症”(urbanphobia)留有篇幅,这不是我的目的。古代城市当然充满着痛苦、犯罪和邪恶。它的居民们当然也曾抱怨过、憎恨过、鄙视过城市。尽管直至今日有关古代的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研究——跟默顿(Morton)和怀特(Lucia White)的有关美国的反城市主义现象的研究相似——还没有人来完成,¹¹我的意思则是:古代城市在其设计中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的。

第二,我必须在此澄清,本书并非提倡回归到古代的秩序中去。我当然注意到在我们今天“开放”的城市和古代“封闭”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磨灭的。我的确还是一个拥护开放城市的市民,而且我对我们城市的看法与考克斯(Harvey Cox)在神学意义上对我们时代的去神圣化(de-sacralized)社会的支持和接受程度是差不多的。¹²

由于某些批评家们可能会认为我的这两点澄清不太诚实,我因此将在这里总结一下——读者将在本书最后一段看到清晰(或许简单)的陈述。尽管古代城市存在着失败,

存在着距离感 (otherness), 现代规划师仍然可以从古代先例中习得重要的一课: 意即, 古代城市想要提供的“模式” (pattern) 无论是怎样取得的, 必须足够地牢固, 以便承受城市格局本身不可避免的动荡 (disorder) 以及其他各种变迁 (vicissitudes), 并且为城市体验提供结构; 一定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古代城市给予了它的居民可以“阅读”的意象性 (imagery), 就像林奇从他那些波士顿的受访者中推导出来的意象那样。¹³ 只不过, 规划师必须学习给予市民更多可以把握的城市意象, 而不是林奇的被调查者所接受的混乱的波士顿意象。

本书的再版正值历史学重又回来变成一种时髦的关口。有关静态“类型”和静态形态学的研究正在不断繁衍, 历史方面的书籍也开始充斥着建筑书店。但是, 那些为建筑师和城市研究者所书写的历史跟历史学家们所书写和阅读的历史有所不同。前者变成了一种目录型历史 (catalogue-history), 没有叙述, 现象化的过去被消化成为一套套没有时间的母题 (motifs), 设计师们可以把它们当成一种外衣来装扮他们的项目, 像通常认为的那样, 以便在公众中间产生出意义的联想 (denotative response)。而市场机制、交通工程师、规划管理者的工作照旧, 他们的罪过现在被一件从历史书籍那里借来的美丽外衣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城市的格局仍然被忘在脑后, 那被掩盖的将不只是罪过, 还有恐怖的后果。在刚刚过去的那段“过去”中, 规划的罪过是给城市强加上一种过度的秩序以及对住宅的集中化, 如今的潮流则是将建筑 (特别是行政建筑或者商业建筑) 当成不需要对城市肌理做出任何呼应的孤立的“建筑”单体。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城市的方格网压制和奴役了建筑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 却是无法无天的建筑物已经毁坏和侵蚀了城市的骨架 (grid)。

当前最有现实意义的提醒就是对城市模式和城市质感 (texture) 的关照。如果一个城市想要变成它的市民们可以“读懂” (legible) 的东西, 市民必须能够在城市中读到起码一个但是最好是多个相互叠加而且容易解读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 必须具备某些混合和交织在其中的公共空间。城市也因此可以通过公共空间上的某些醒目甚至招摇的机构性建筑向它的市民们展示自己。这似乎是只有在 20 世纪末才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城市被当成了一种三维的实体。天际线必须不能——用舒耶勒的话说——“极像是”从随机的街道网格上升到天空——纯粹是“商业操纵的结果”, 而应该变回成为一种“建筑性前瞻”的结果。

此类建议只能留作未来的研究工作。本书主要关心的是古代罗马。某些近期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已经修正了我某些陈述的要点。最重要的挖掘就是在靠近罗马广场 (Roman Forum) 的圣奥姆波诺 (St Ombono) 老教堂的古代圣殿的挖掘工作。现在, 人们在那里发现了黎明女神 (Mater Matuta) 和幸运女神 (Fortuna) 的双圣殿 (twin temples)。根据纪年史学家 (chroniclers) 和编年史学家 (analists) 的说法, 它们是罗马王塞维乌斯·图利乌斯 (King Servius Tullius) (统治于公元前 577—前 534 年) 建造的, 并被荣耀的

塔尔奎王 (Tarquin) (统治于公元前 534—前 509 年) 更加辉煌地重建了一次。对基地上木质遗存的放射—碳检验支持着编年史学家的说法。¹⁴

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由挖掘者弗兰克·布朗 (Frank Brown) 对罗马广场上雷吉亚神庙 (Regia) 遗址、著名的努马王 (King Numa) 居所所进行的二度检查。布朗的工作的确改变了我在 82 号图片¹⁵下面注释的有关此处最早建筑的认识。现在, 基地上最早的木构棚户可能就是在公元前 7 世纪末的一场洪水之后被埋在地下的。对于木材的放射—碳检验给出树木被砍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680 年前后。根据编年史的记载, 这个时期应该是在努马王传统的统治期 (公元前 713—前 679 年) 之内。在洪水过后, 在君主制时期 (Monarchy) 跟着有过四个建设阶段, 也就是在这时, 雷吉亚似乎有了两个神殿。但是, 这两个神殿都没有严格的正向 (除了南墙)。在共和制 (Republican period) 的初期, 大约是公元前 510 年, 当雷吉亚被完全重建的时候, 巨大的圆形火塘就建在了它如今的位置上。

除了雷吉亚之外, 柯莱理 (Filippo Coarelli) 最近的研究确定了罗马广场¹⁶上某些建筑的用途并对其走向进行了重新介定。我曾经试图断定的那个可能是“罗慕路斯之墓”的“黑石堆” (the Lapis Niger), 被柯莱理称为“火神庙” (the Volcanal); 传统的说法是, 罗慕路斯消失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神”或者说被供奉为“奎里努斯”神 (Quirinus), 因此罗慕路斯的“墓”应该是喻象性的, 这里, 或许应该管这个“黑石堆”叫“英雄庙” (heroon), 这是罗慕路斯那令人发指的谋杀发生的地方。

“黑石”前的道面可能是在苏拉 (Sulla) 时代完成的, 与罗马广场的扩大和改建以及原本可能是圆形的会合广场 (Comitium) 的迁移同期。此地出土的一个异常精美的阿提卡黑像瓶 (Attic black-figure vase) (时间可以比较精确地界定在公元前 570—前 560 年之间) 的残片提供出在黑石下埋葬的那座小庙的大致建造年代 (date ante quem)。¹⁷

自从本书出版后, 我又发现了很多可以进行比较的材料。人们在拉维尼姆 (Lavinium) 十二祭坛的基地、也就是在罗马行政长官们进行职权交接 (laying down office) 祭祀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英雄庙, 这个圆形冢的建造时间可能在公元前 675—前 650 年, 跟我曾讨论过的在帕埃斯图姆和昔兰尼处的圆形冢相似。它可能就是哈里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所暗示的埃涅阿斯 (Aeneas) 的英雄冢。¹⁸ 人们还在班提亚 (Bantia) (现在叫班提亚的圣玛利亚 (S. Maria di Banzia) ——在路奇尼亚 (Lucania) 靠近维诺萨 (Venosa) 的地方)¹⁹ 发现一个比寇萨遗址更加生动的吉象观测所, 此外, 在卡庇托山 (the Capitol Hill) 上初步辨认出来一处罗马吉象师 (augur) 的高地观测点 (eyrie) 或者是一处圣域 (templum)。现在看来, 吉象观测点所组成的界线都与某些地标有关, 罗马曾有多处这样的高地观测点。这些高地观测点的周围并无所谓的“环城带” (pomoerium)。而城市周围是需要空地环绕以便将城市的基地限定成为“解放出来并受到 (天神) 保护” (liberatum et effactum)²⁰ 的场所。除了罗马之外, 人们已经辨认出寇

萨的具体形态，布朗——就是前面提到的罗马广场²¹的发掘者——辨认出了该城市的各个发展阶段。

对于更大的命题——比如，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的出处、伊特拉斯坎人的语言、罗马人对希腊和伊特拉斯坎传统的承袭——我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可以报告。1985年是“伊特拉斯坎年”，当年曾经举办了比较重要的展览并出版了许多新书，详尽地介绍了目前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但却没有给出什么答案。²²虽然现在可以汇编出一个小型的伊特拉斯坎词汇表，但是对于该语言的语法和句法架构的认识仍然模糊。显然，伊特拉斯坎语既不是印欧（Indo-European）语言也不是闪米特（Semitic）语言。它可能属于某些原地中海（proto-Mediterranean）语言群——对于后者我们至今是一无所知。²³如果没有更多的发现，仅就目前的语言学研究还不能帮助我们揭开伊特拉斯坎人出处的谜团。²⁴

虽然希腊人对罗马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对位于西西里（Sicily）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叙拉古（Syracuse）北部希伯拉亚山城（Megara Hyblaea）——的挖掘表明，该城的格局肯定没有被“方化”过（*quadratus*）；它的初始点明显是一个位于中心的希腊式广场（*agora*），并在一级街道和二级街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者的走向也没有关系），这一点则暴露了希腊和伊特拉斯坎城镇在布局方法上的不同。²⁵

希腊语与拉丁语也明确地显示着不同背景下城镇的差异：单词 *urbs* 可能就出自伊特拉斯坎语，它只是隐隐地连向 *civitas*——也就是代表一组 *cives* 的集合名词。我们对 *civis* 的常规翻译是“市民”（*citizen*），但是 *civis* 本来有着更多的含义：它还指一个自由的男人、一个家庭的户主。*Urbs* 指代的是城市被如何物质化、仪式化和合法化地建造起来的方式。而希腊词汇中的 *polis* 指的是一个防御性场所，那么，*polites* 指的是住在城墙以内的人。可见，有关城市和市民的词汇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通过不同方式联系起来的：这可能部分地是因为伊特拉斯坎人用自己的 *urbs* 取代了来自印欧语系中“城市”（*tota*）的过程所形成的，而 *tota* 则在与伊特拉斯坎相邻的奥斯坎（Oscan）语中活了下来。²⁶

有关罗马城市和希腊城市的奠基（*foundation*）（后文有时也译为创建——译者注）及奠基人（*founder*）（后文有时也译为创建者——译者注）之间的关系如今仍然是诸多最有趣的问题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许多希腊城镇的英雄奠基者和再奠基者的名字，但是有关他们都做了什么以及有什么仪式我们知道的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²⁷在罗马人那里，情形是反过来的。罗马城市（或者殖民地）的奠基人是有名有姓的，但是他们并不受到尊敬，也从没有被英雄化。似乎希腊城市的奠基和再奠基活动是一种由某些单独受神灵启示的人所进行的工作，而罗马城市的奠基和再奠基活动则总是一种替代性活动（*vicarious action*）。²⁸每一个罗马城市的奠基人都是在代表罗慕路斯：因为每一个城镇、每一次奠基都被看成是对罗马的重演（*reiteration*）。当然，即便当年普卢塔克